

经济全球化与国际人口迁移

李其荣

本文从经济全球化的视角,探讨了国际人口迁移的历史渊源,归纳了国际人口迁移的政策模式,总结了国际人口迁移的新特点和类型,分析了国际人口迁移的作用,并对全球化形势下中国移民政策策略提出了若干思考。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国际人口迁移 移民

作者李其荣,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地址:武汉市,邮编 430079。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经济全球化呈加速趋势,在世纪之交人类社会已真正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人口迁移表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也出现一些问题。因此,这些问题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国际学术界研究视点主要集中在:国际移民的全球趋势及问题;从区域视角探讨国际移民的模式、趋势与政策;国际移民、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的互动;技术移民与知识的新地缘政治学。在我国,移民和人口迁移的历史长期受到重视,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迁移理论;中国移民的历史;国际迁移政策;经济全球化与国际人口迁移;国际人口迁移中高级科技人才的流失等。这些研究对于揭示移民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认识人口迁移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国际人口迁移的研究中还存在某些不足:(1)关于经济全球化与国际人口迁移的关系近年已有人注意,但对有些问题的研究还有待深入。(2)尚未形成相对独立的国际人口迁移理论,对一些国际人口迁移的分析分散在其他一些理论和学派的论述中。关于国际移民政策已有一些相关论文,但未能从理论高度进行抽象、归纳。(3)国外重视对国际人口迁移发展趋势的研究,而国内缺少对此问题的前瞻性研究。(4)海外华侨华人研究多是从中国而非全球化的视角出发,未能揭示中国人口的国际迁移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缺少对中国移民政策的研究。

本文通过对经济全球化与国际人口迁移的研究,试图探讨国际人口迁移的历史渊源,归纳国际人口迁移模式,总结国际人口迁移的新特点和类型,分析国际人口迁移的作用,为国际间

参见[英]彼得·德鲁克著、张达文译:《移民将成热点问题》,《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2年第1期。

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佟新:《全球化下的国际人口迁移》,《中国人口科学》2000年第5期;解韬:《经济全球化与国际人口迁移》,《广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丘立本:《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人口的国际迁移》,《侨务工作研究》2002年第2期;陈勇:《当今永久性国际人口迁移现状及其特点》,《人口与经济》2000年第2期。

参见陈孔立:《有关移民与移民社会的理论问题》,《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人口迁移提供带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经验,为我国合理布局生产力、组织人口迁移和实现全面小康,提供可操作的构想。

一、国际移民历史、理论与政策

人口流动从来就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部分。当今国际人口迁移的增长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直接结果,其过程“反映了社会不断向现代性的方向发展”,“历史延续下来的国际间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二元结构形成了国际人口迁移的推动力和吸引力”,经济一体化将加大国际人口迁移的规模和范围,体现了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的重塑过程,只要世界上存在不平等的格局,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从属地位将难以改变。在对待国际人口迁移问题时,不同国家采取的政策是截然不同的。

人类历史伴随着人口流动。大约在4万年以前,早期的人类居住在非洲和欧洲。1-2万年前,人类的一部分迁移到大洋洲;亚洲人类的一部分经白令海峡到达北美洲,继而到达南美洲,成为最早的印第安人。

古代末期到中世纪初期,在欧洲,日耳曼人逐渐扩散、分居到中欧、西欧和北欧;斯拉夫人的一支——南斯拉夫人逐渐扩散、分居到东欧。在亚洲,阿拉伯人从阿拉伯半岛逐渐扩散、分居到西亚和北非;突厥人逐渐扩散、分居到中亚和小亚细亚。在非洲,班图人从尼罗河流域扩散、分居到非洲南部。

15世纪以来,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殖民主义和工业化促使移民流动迅速增长。殖民主义使得欧洲人作为水手、军人、农民、商人、僧侣以及行政人员迁居海外。15—19世纪,欧洲殖民者从殖民地获取了大约1500万的劳动力,其中有不少是非洲奴隶和契约劳工。西欧的工业化驱使无地而贫困化的人们大规模迁居别的大陆。1861—1920年迁居美国的移民有3000万人。美国立国和经济发展靠的就是这些移民。在西欧内部,各国经济的工业化也大量利用移民劳工,如英国用爱尔兰人、德国用波兰人、法国用意大利人,等等。

1918—1945年间,移民人数下降。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停滞和政治动乱。美国“本土主义者”宣称:南欧和东欧人“无可同化”,对公共秩序和美国价值观构成威胁。为了阻止移民大规模入境,美国国会进行立法,实行移民配额制度,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种状况才改变。在这期间,法国是招募外国劳工的惟一国家。在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时期,许多移民被遣送出境,1936年时外籍人口减少了50万。在纳粹德国,当时的政权主要依靠暴力征召了大量外国劳工,替代应征入伍的德国男子去务工。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移民的范围和数量大为扩大。1945—1973年,长时期繁荣的刺激导致不发达地区的劳工大规模迁入西欧、北美和大洋洲。1973年“石油危机”导致经济严重萎缩,因而影响了国际人口迁移。接着,资本从原来的经济中心转移,跨国的生产和分配方式重新形成了世界经济的大格局。新类型的移民纷纷进入一些较老的工业国家,而在南欧、海湾石油国家、拉美、非洲和亚洲则有新的移民输入国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早期,移民活动之盛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联合国的数字表明,全球移民总量从1965年的

佟新:《全球化下的国际人口迁移》,《中国人口科学》2000年第5期。

参见李宏规:《国际人口迁移与国家政策》,《南方人口》1997年第3期。

7500 万增长到 1990 年的 1.2 亿。以德国为例,说明国际人口迁移的速度之快。1961 年德国的外来人口不到 686,200 人,占德国总人口的 1.2%;到 1997 年底,德国的外国人口为 730 万,占德国总人口的 9%,其中 97% 的外来人口居住在原西德地区。德国最大的移民集团是土耳其人,为 197 万,前南斯拉夫人有 92 万,意大利人有 56 万,希腊人有 35 万,波兰人有 29 万。欧盟统计局估计,2002 年欧盟新增了 134 万人口,其中 3/4 以上是新移民。爱尔兰的人口增幅最大,为 1.22%,总人口达到 393 万人。德国是欧盟人口最多的国家,接着是法国和英国。以上情况表明,当今国际人口迁移的数量与规模大大增加了。

如何理解这些新型的国际人口迁移呢?中外学者都试图从理论上进行解释。诸如主导了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移民思想的新古典派,20 世纪最后 25 年里又出现了一大批理论和观念框架:“劳动力迁徙新经济学”、“双重劳动市场论”、“世界体系理论”、“移民网络”,等等。马德里康普露滕斯大学社会学教授华金·阿朗戈指出:“这些理论探讨都有助于理解移民产生的原因及其自我延续的机制。但总体上并不令人满意,移民理论建设的天空还没有到澄碧如洗的地步。”如何看待人口的国际流动,在今天的国际社会中也成为识别国际关系理论的标准之一。日本学者平野健一郎指出:“以往的国际关系理论不能正确分析‘人口的国际流动’现象。为了创建在理论上能够分析这一现象的国际关系论,首先必须掌握人口的国际流动的实际情况,对这一现象的形态进行分类,分析人口的国际流动发生的原因,并阐明人口的国际流动的影响和意义。”世纪之交国际人口迁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使得中国学者开始关注移民理论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赵敏认为:“目前还没有形成一种相对独立的国际人口迁移理论,对一些国际迁移的分析分散在其他一些理论和学派的论述之中。”她通过对新古典经济学、新迁移经济学、劳动力市场分层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移民网络理论、国际迁移的累积因果关系理论等学科和学派的国际人口迁移假设的分析,检验这些假设在不同时期和地区的有效性,并对这些具有代表意义的国际人口迁移理论假设重新评估。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张晓青认为,近二三十年出现的各种移民理论“基本上可以解释复杂多样的国际人口迁移现象。不过,不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笔者认为,中心—边缘的国际迁移理论能够说明当今大规模的国际人口迁移现象,它借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在一个较大的地区共同体内,某些地段先发展起来,形成发展的“中心”;后发展地带成为“边缘”,受“中心”剥夺。该迁移理论认为:“历史上与中心国家有过接触或遭受过它们的殖民的边缘国家往往会有大规模的移民迁往中心国家。最明显的例子是拉丁美洲各国向美国的大规模移民,反映出美国对邻近它的边缘地区的扩张。扩张的过程中,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些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状况,尤其是刺激了边缘国家人民的消费欲望。而边缘国家不断经历着被融入中心经济或世界经济的过程,为这些国家的人口向其迁

参见[澳]斯蒂芬·卡斯尔著,凤兮译:《21 世纪初的国际移民:全球性的趋势和问题》,《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01 年,第 18 卷,第 3 期。

参见 Richard M. Uch, *Nation and Citizenship in the Global Age*, New York: Palgrave, 2001, p. 103.

参见美联社布鲁塞尔 2003 年 1 月 10 日电:《移民为欧盟人口增加新鲜血液》,《参考消息》2003 年 1 月 22 日。

[西]华金·阿朗戈著,黄为葳译:《移民研究的评析》,《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01 年,第 18 卷,第 3 期。

[日]平野健一郎著,汪婉译:《人口的国际流动和国际关系理论》,《国外社会科学》1997 年第 2 期。

赵敏:《国际人口迁移理论评述》,《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8 年第 1 期。

张晓青:《国际人口迁移理论述评》,《人口学刊》2001 年第 3 期。

参见钱乘旦主编:《欧洲文明:民族的融合与冲突》,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3 页。

移提供了动力和可能。”发达国家主导全球范围的不平等的政治和经济格局,使得发展中国家无法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赖。虽然发达国家对人口迁移进行限制,但是这些发达国家接受了相当数量的国际移民。

对待国际人口迁移,各国采取了不同的移民政策。卡斯尔斯和密勒在《迁移的时代》一书中将人口国际迁移的政策模式分为三种:排斥模式、共和模式和多元文化模式。

严格来说,排斥模式并不准确。卡斯塔斯后来用“差异排斥模式”的提法取代“排斥模式”。谢晋宇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他认为:“这些国家只是在接受移民的存在方面有些犹豫,在允许这些移民进入时主要是出于经济原因,这一模式的特征是,在接纳移民的归化方面有十分严格的要求。”日本采取的是差异排斥模式。为了维护文化的完整统一性,“日本一直把限制外国移民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在经历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日本国内劳动力短缺问题逐渐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各界特别是工商界要求开放劳动力市场的呼声越来越高,移民政策也逐渐松动,其移民政策变化主要表现在:第一,对非技术劳动力移民限制更加严格;第二,发展培训外国劳动力制度”。目前,日本采取的移民政策是,进一步开放高技术人才市场。德国采取的也是差异排斥模式,德国自身认为“并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它认为国家是在“血缘”的基础之上建立的,其原则是儿童国籍取决于父母的国籍。

“共和模式所遵循的则是所谓儿童国籍取决于出生地的原则,其公民资格强调土地权利,而不是血缘权利,在原则上,所有被允许进入这些国家疆土的人或其疆土上长久居住的人,都属于这个国家。外国人在理论上能够马上获得他们居住的国家的国籍,并且相应获得与这个国家的土著居民一样的权利。”法国是这一模式的典型。法国对待外来移民的政策是矛盾的:一方面强调非法移民一旦被发现,本人必须被遣送,雇主必须被课以重罚;另一方面,对已经入境的移民实行大赦,使之从非法居留转为合法居留。法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先后实施了三次大规模的“合法化行动”:第一次从1981年8月到次年6月,共有14.5万人提出申请,13.2万人获得了合法身份;第二次“小赦”始于1992年,法国境内数万非法移民依据政府“放宽移民政策”的相关条令,获得了合法身份;第三次“无证者身份合法化行动”从1997年6月开始,到1999年初,共有14.3万人提出申请,约8万人获得批准。

多元文化模式与共和模式一样是一种包容的吸收模式。这一模式在文化政策上不要求移民在文化上的同化,容忍甚至鼓励文化上的差异。加拿大和美国是这一模式的典型。加拿大2001年人口普查统计数字显示,华人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有色人种群体,人数达120.94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3.5%。过去10年来,加拿大人口有十分明显的变化,从移民主体的角度看,来自亚洲的移民逐渐取代了欧洲移民。也因为如此,加拿大的社会也愈来愈趋多元化。目前,加拿大境内海外出生的加拿大人占总人口的18.4%,使加拿大成为仅次于澳大利亚的第二大移民国。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也是一个多元文化国家,“美国人口的种族结构和民族成分体现了‘主体多元’格局,在1987年的美国人口中,白人占近85%,黑人占12%,亚裔人占

佟新:《全球化下的国际人口迁移》,《中国人口科学》2000年第5期。

谢晋宇:《90年代以来欧盟国家国际迁移和国际迁移政策》,《人口研究》1999年第2期。

王胜今、于潇:《日本劳动力移民政策走向及非法移民问题》,《人口学刊》1999年第6期。

参见李明欢:《欧盟国家移民政策与中国新移民》,《厦门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参见中央社多伦多2003年1月22日电:《华裔已成加拿大最多有色人种》,《参考消息》2003年1月25日。

1.6%,印第安人占0.6%,其他占0.8%”。2000年美国人口普查表明,当今美国的种族构成是:白人占了69.1%,讲西班牙语美国人占12.5%,非洲裔美国人占12.1%,印地安人及阿拉斯加原住民占0.7%,亚裔美国人及太平洋岛原住民占3.6%,其他占0.3%,两个以上种族的占1.6%。“随着亚裔和拉丁裔人口的急速增长,种族多元化在美国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为明显”。关于移民政策,按照丁则民的看法,“美国建国以来移民政策的演变经历了自由移民时期(从建国起到1882年排华法的实施)及限制和选择移民时期(从1882年排华法的实施到现在)”^⑩。美国于1994年通过了充满反移民情绪的187法案,1996年又通过了一项新的“30年来最严厉的移民法”,^⑪其打击、限制的对象“从非法移民扩大到了合法移民”,^⑫从1996年移民法颁布以后,美国的移民政策一直变化不大。布什上台后,移民政策总的趋势是比较宽松,布什认为移民是美国自信和成功的标志。而“9·11”事件改变了一切。为了加强国内安全,布什政府加强了对外国学生的控制,加强边境管理,拆分移民局。但是,在“9·11”事件的冲击下美国已经出台和即将出台的严格的移民政策只是暂时和局部的,从长远看,“美国的移民政策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吸收一定数量的移民是美国的既定方针”。^⑬正如戴超武所指出:“不论美国未来的移民政策如何变化,其政策的核心依然是吸收美国需要的各类人才,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⑭目前美国主要是吸引高科技人才,高原在分析美国吸引高科技人才的方法时所指出:“为了争夺21世纪科学技术的领先地位,美国正瞄准新的科技目标,在世界范围里大力吸引高科技人才。”^⑮美国坚持开放政策,接纳世界各国各族裔移民的立国传统是不会改变的。

二、国际人口迁移特点、类型、影响和趋向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国际人口迁移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呈现出不同的类型,国际人口迁移对迁出国和迁入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并成为世界各个地区社会转型的一个重大因素。

经济全球化导致了国际人口迁移的新特点的出现。一个重要特点是,国际人口迁移的流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国际人口迁移的流向是,从宗主国向殖民地和附属地迁移,如英国向美国、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等地迁移人口;从较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及新开发地区移民,如欧洲国家向拉丁美洲各国移居人口,从旧大陆向新大陆迁移人口,即欧、亚、非三洲人口向北美、拉美、大洋洲迁移。新型的国际人口迁移流向则发生了巨大变化,从20世纪60年代起,国际人口迁移的主要方向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移居,亚非拉发展中地区向欧美、大洋洲发达地区迁移人口。1960年共有325万人从发展中地区向发达地区移居,1974年已激增至

高鉴国:《试论美国民族多样性和文化多元主义》,《世界历史》1994年第4期。

参见姬虹:《从2000年美国人口普查看美国种族现状》,《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美]埃里克·方纳著、王希译:《美国自由的故事》,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58页。

⑩ 梁茂信:《美国移民政策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⑪ 周琪:《日益升温的美国反移民情绪》,《美国研究》1997年第1期。

⑫ 潘兴明:《试析1996年美国移民“改革”》,《人口与经济》1997年第6期。

⑬ 姬虹:《“9·11”事件与美国移民政策》,《国际论坛》2002年第5期。

⑭ 戴超武:《美国移民政策改革的基本走向及其潜在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年第5期。

⑮ 高原:《美国吸引高科技人才的方法》,《21世纪》2000年第4期。

947.5万。以美国为例,20世纪60年代前的移民,82%来自欧洲;90年代后的移民主要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90年代,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约有一半的新移民来自亚洲。另一个特点是,国际移民成分的多样化。随着新的国际分工的出现,不同的劳动力满足了不同的市场需求,由此构成了多样性的移民群体。经济全球化为具有技术专长的人提供了更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因此,20世纪八九十年代,技术移民剧增成为全球化的一个突出的现象,并呈膨胀之势。如“哥伦比亚的知识分子前往美国、西班牙和澳大利亚;古巴医生到南非;南非护士去英国和新西兰;新西兰博士后赴加拿大;加拿大科研人员到美国;法国金融交易员去英国,年轻科学家去美国;香港工程师赴澳大利亚、美国和英国;印度信息技术专家前往德国和美国;阿根廷心理分析师奔向墨西哥、西班牙或美国,等等”。技术移民的流向基本一致,即从世界知识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前往更具活力的地区。从发展中地区向发达地区迁徙的工人增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外籍工人多于发达国家。”外籍工人是一种国际契约劳工,他们到国外谋生,只是为了赚钱,并非想永久定居下来取得国籍;对于迁入国来说,他们是廉价的劳动力,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外籍工人主要集中在北美、西欧、南美、中东、南非、澳大利亚等地,有人估计人数在3000万左右。为满足国际劳动力市场多样性的需求,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劳动力市场上还活跃着一支女性移民大军,亚太地区大约有150万妇女在国外从事低收入的服务性工作。

国际人口迁移可以被分为若干类型。分类标准有许多:按时间划分,可以分为永久性迁移与暂时性迁移;按迁移跨越的行政界限划分,大致可以分为国内迁移、国际迁移与地区间的迁移;按引起迁移的原因划分,主要可以分为政治性迁移、经济性迁移、环境因素引起的迁移以及其他不属于上述三种原因的如医疗卫生引起的迁移等等;按迁移者本身在迁移决策过程中的自愿、自主程度,可以分为自愿性迁移与强迫性迁移;按照生存状况好坏划分,移民可以分为智能型、劳工型和难民型,等等。诸如此类的差别表明,对移民的界定毫无任何客观标准,“一切取决于国家政策,而政策则是对政治和经济情况方面的需要以及对公众态度的反应。”参考卡斯尔斯的研究,笔者倾向于把国际移民分为以下六大类:

第一类:临时性劳力移民,或称为客工或外国合同工。这些男女工人短期迁居(从几个月到几年),打工挣钱,寄款回国。

第二类:高技能和经营移民。这些人拥有经理人员、执行官员、专业人员、技术人员等等资历,在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的内部劳动力市场流动,或是通过国际劳动力市场应对稀缺技术的需求寻找职位。许多国家欢迎这一类的移民,特别安排了诸如“技术和经营移民”计划欢迎他们入境。

参见邬沧萍、侯文若:《世界人口纲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92页。

参见[澳]斯蒂尔·卡斯尔斯著,黄语生译:《全球化与移民:若干紧迫的矛盾》,《国际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

[法]让·巴蒂斯特·梅耶等著,祝东力译:《技术移民与知识的新地缘政治学》,《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02年,第19卷,第2期。

John R. Weeks, *Population, Californi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89, p. 215.

参见解韬:《经济全球化与国际人口迁移》,《广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参见周皓:《国外移民模式》,《人口研究》1999年第3期;Jefferson M. Fish, *Race and Intelligence*,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2002, pp. 249 - 252.

参见韩更生、杨金星:《国际人口迁移概观》,《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4年第4期。

参见[澳]斯蒂芬·卡斯尔斯著,凤兮译:《21世纪初的国际移民:全球性的趋势和问题》,《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01年,第18卷,第3期。

第三类:非正规移民,或称为无证件的或非法的移民。这些人进入外国,通常是为了寻求工作,但没有合法证件或未经许可而大量见于许多劳工移民流之中。迁入国有时对他们持默许态度,这是因为国内雇主有此需要,而此类人员之来既然属于非法,也就没有社会代价和提供保护的问题。

第四类:被迫移民。从广泛的意义说,这类移民不但包含难民和寻求避难者,而且包含因环境灾难以及建设工程(例如修建工厂、道路或水坝)而不得不迁居的人们。按照联合国1951年“难民地位协议书”的规定,难民是指由于害怕“因种族、宗教、民族、属于某一特定社会群体或政治观点而受到迫害”,所以居住国外而不能或不愿返回本国之人。该协议书的签字国承担责任保护难民,许可他们入境,给予他们临时或永久性居留地位。难民组织、特别是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留意明确区分难民和移民。但这两种人确实有相同之处,那就是他们在所居留的地方都有同样的社会需要,也受到相同的文化冲击。寻求避难者是指那些越过边境寻求保护,但未必严格符合1951年协议书有关规定的人。当代许多较不发达国家中冲突迭起,个人之求外迁移是由于遭到迫害,抑或是由于为生存之所需的经济和社会结构遭到破坏而生活绝望,这两种情况实难区分。寻求移民的两种动机,一个是经济的,一个是政治的,都离不开当地普遍而持续的暴力环境,而造成这环境的非殖民化和全球化的迅速过程,则是由发达国家安排下的。

第五类:家庭团聚移民。许多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欧盟大多数成员国,都在原则上承认合法移民享有和家庭成员团聚的权利。

第六类:归国移民。指移居外国一段时间之后返回本土的人们。移民返乡,常常受到嘉许,因为带回去资本、技术和经验而于本土的经济发展有益。许多国家制定了特别的条例来利用这种“发展潜能”。但是,有些国家的政府却对这一类人投之以怀疑的眼光,因为他们可能带来不同的政见而成为政治或文化变化的导因。

国际人口迁移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是双重的,既有积极的,又有消极的。从正面影响来说,对移民接受国的作用是:“增加人力资源,弥补本国劳动力的不足,许多迁入者具有较高的生产知识和技能,既解决了相应专业人员短缺的困难,又节省了培养该类专业人员的投资,因而起到促进接受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以美国为例,美国吸收外国的高级科技人员用于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和物质生产等多种领域,获得相当大的效益。高级科技人才流入美国,为美国节省了大量的教育和培训费用。据估计,美国大学生取得学士学位需花费约10万美元,大学毕业以后再取得硕士学位需花费约5万美元,进而再取得博士学位至少还需花费5万美元以上。换言之,一个学生取得硕士学位共需花费15万美元,取得博士学位共需花费20万美元以上。从移民迁出国方面考察,移民寄回母国的汇款增加了迁出国的外汇和投资能力。据联合国统计,国际移民每年的汇款额约达660亿美元,在全球财政收入中仅次于石油,多于外国政府提供的财政援助。

国际人口迁移在人口增长和就业上起着重要的作用。据有关资料统计,1990—1995年间

参见[澳]斯蒂芬·卡斯尔斯著、凤兮译:《21世纪初的国际移民:全球性的趋势和问题》,《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01年第18卷,第3期。

李宏规:《国际人口迁移与国家政策》,《南方人口》1997年第3期。

参见马侠:《论“脑流失”》,《人口研究》1993年第3期。

参见韩更生、杨金星:《国际人口迁移概观》,《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4年第4期。

在较发达地区的全部人口增长中,有45%是由于国际迁入人口形成的;在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四国,占人口增长的1/3;在欧洲国家,人口增长的88%来自国际人口迁移。与此同时,国际人口迁移使不发达地区的人口增长率下降了3%,其中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人口增长率下降了7%。

移民对经济和就业的影响,一直是许多研究的主题。国际人口迁移缓解了发展中国家高速增长的人口对有限资源的压力,使移民迁出国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得到更多的就业和工作机会。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移民对迁入国的劳动力市场是否有冲击?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以美国为例,有人认为:“移民是廉价的劳动力,‘偷窃’了美国人的工作。这是那些希望对各种类型的移民采取更严厉的限制甚至加以停止的人们想法的宣言。”事实表明,“移民对本国劳动力就业机会产生了很小的影响,略微减少了低技术工人的就业机会。这有几个原因。首先,移民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这是由于移民促进了工业的持续发展,增加了对商品的需求,为国家经济发展增加了新的企业家。此外,由于语言、教育和以前工作经验的缺乏,新移民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与本国工人产生了竞争。事实也表明,移民对一般的工资水平几乎没有影响,虽然在一些地方经济欠佳和移民居多的地区,低技术工人的工资也许受到不利影响。最后,移民包括不是充当美国纳税人的非法移民,是实际的获利者——他们向政府缴的税款多于他们从政府获得的利益。”关于这一点,一些明智的美国政府领导人看得很透彻。1986年,里根总统在评价移民的作用时说:“外来移民为其他工人增加了就业机会并提高了工资水平,他们个人的投资和努力作为他们自己和整个国家都带来了经济上的好处”。暨南大学历史系的陈奕平在分析当代美国西裔人口对美国的影响时指出,西裔人口的剧增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发展,“从购买力看,2000年,西裔人口的购买力高达4524亿美元,比1990年增长118%”,据有的美国学者预测,“西裔人口的购买力到2050年将达到1万亿美元”。包括西裔美国人在内的外来移民对美国的税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80年代的一项研究显示,大约1100万移民劳动者每年收入为2400亿美元,交税达900多亿美元,远远多于其在社会福利中所获得的50亿美元。”可见,总的来看,移民是美国的财富,不是美国的包袱。

国际人口迁移对迁入国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以美洲为例,大规模国际人口迁移,“使拉丁美洲成为世界不同种族和不同民族的人群相互杂居的地区。属于不同种族和民族的广大移民把各自的语言、宗教、风俗习惯和文化艺术带到了拉美。这些不同渊源的文化之间,以及它们同印第安文化之间,经过长期的互相影响和互相适应的过程,终于形成一种新的拉美文化。在当今拉美文化各个领域,人们既能看到欧洲文化的影响,又能看到非洲文化的影响,甚至有时还能看到东方文化的影响”。拉丁裔人口在美国所占比例越来越大,拉丁裔特别是墨西哥人对美国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这一代人要将美国文化打上拉丁的印记。如果说上一代的

参见李宏规:《国际人口迁移与国家政策》,《南方人口》1997年第3期。

Peter Duignan and Lewis H. Gann, *The Debate in the United States over Immigration*,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1998, p. 224.

Stanley L. Engerman and Robert E. Gallma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3: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538 - 539.

转引自梁茂信:《外来移民对美国经济和就业市场的历史影响——兼论中美学者的观点》,《世界历史》1996年第3期。

陈奕平:《当代美国西班牙裔人口的变动特点及其影响》,《世界民族》2002年第5期。

夏丽仙:《国际人口迁移与拉丁美洲》,《拉丁美洲研究》1992年第3期。

拉丁裔移民被迫与盎格鲁—美国文化同化,那么在这一代,美国社会随着更多的拉丁裔移民变为美国人,也变得更为拉丁化。”不同国籍、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的生活习俗在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反映出来。如纽约的城市建筑风格,吸收了各民族文化的特点,形成了实用、和谐统一的物质形态。在报业方面,移民创办了具有多种文化背景的多报刊杂志,如《纽约周报》、《自由问询报》、《纽约先驱晨报》、《纽约世界报》和《纽约时报》,等等。加拿大是仅次于美国的人口迁入国,目前加拿大的移民来自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也使加拿大的种族、语言构成更趋多样化。如1981—1991年到达加拿大的133万移民中,来自欧洲的移民比重为26.4%,而来自亚洲的移民比重却高达46.5%,仅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移民就占了12.9%。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也带来了各地的语言,现在,加拿大有多达11个语系的50个语族的语言。据1991年人口普查,加拿大有20%的人会讲英、法两种法定语言之外的语言,其中华语是仅次于意大利语和德语的第三大非法定语言。有这么多人口迁居加拿大,与加拿大政府实行多元文化和多元民族的政策有关。长期以来,加拿大政府对有色民族实行同化政策。由于这种政策遭到许多亚洲移民的抵制和批评,于是,1971年特鲁多总理宣布了多元文化政策,1987年又确立了多元文化原则。为了实施多元文化政策,加拿大政府于1976年通过《人权法》,1982年通过《权利与自由竞争法》,1988年加拿大众议院通过《多元文化法》。这一政策得到了加拿大人民的广泛支持,并有利于移民的生存和发展。

但是,国际人口迁移对迁出国和迁入国也有负面影响。对原籍国的负面影响主要是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流失,进而可能会影响原籍国的经济发展。非洲近十年来,已有1/3的高级人才流失。中国大陆人才流失也相当严重,1989年以后,“人才外流成为一种潮流。许多西方政府允许中国学生、学者在所在国滞留一个时期,结果,有5万中国学生和学者留在美国,1万多中国学生和学者获得在加拿大工作的权利,有2万中国学生、学者留在了澳大利亚”。人才外流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但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才外流成为现代国际人才流动的主流。陈昌贵认为其趋势有几个特点:第一,人才外流的速度日益加快,数量不断增长;第二,人才外流以亚洲为最甚;第三,人才主要从第三世界国家流向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第四,外流人才的学位等级较高;第五,以“合法移民”身份外流的专业技术人员增长较快。从迁入国方面考察,移民特别是难民的大量涌入加剧了世界部分地区的紧张局势,造成了某些地区不安定的因素。由于大量移民特别是非法移民的涌入,在短期内难以解决住房和就业问题,因而加剧了社会矛盾。美国华人学者彼得·邝在论述美国的非法中国移民时指出:“许多人非法进入美国,他们在唐人街生活,各方面都要付出常人难以预料的努力。数量巨大的新移民搅乱了已经饱和的唐人街劳动力市场,使这里的经济陷于萧条,几乎成为一个绝望之地。非法移民对于唐人街的严重冲击并不在于其数量,他们也许还占不到唐人街人口的20%,却大大地

朱世达:《将诞生一个“拉丁美国”吗?》,《世界知识》2000年第6期。

参见林广:《移民与纽约城市发展》,《城市问题》1999年第2期。

参见李玲:《加拿大人口发展与人口迁移》,《人口与经济》1995年第5期。

参见黄昆章、吴金平:《加拿大华侨华人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40—241页。

David Zweig and Chen Changgui, *China's Brain Drain to the United States*,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5, p. 7.

参见陈昌贵:《人才外流与回归》,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7—33页。

搅乱了社区的经济和社会平衡。”

国际人口迁移的发展趋势,在国内很少有人分析,而解韬的观察是富有预见性的。他认为国际人口迁移有三个发展趋势:一是传统移民国家如美国增强了对国际移民的选择性;二是穷国向富国的国际人口迁移将会继续存在;三是民族主义的抬头使排外主义和种族主义问题日益突出。近年来,国外学者很注意移民的发展趋势,综合有关学者的论述,国际移民的发展趋势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全世界移民总数趋向增加,移民种类花样翻新,有高技能移民和寻求庇护者,还有非常规移民、短期移民和过境移民。女性迁移增多因而越来越成为国际人口迁移研究中人们关注的重要对象,到1990年为止,全世界生活在出生国之外的妇女总共有5700万人,占国际移民总数的48%。同时,我们还看到,移民的比例在发展中国家下降了,在发达国家则显著增长,随着移民趋势的加剧,不少国家增强了对移民入境的严格控制。对于发生在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主管地区的国际移民来说,20世纪90年代是动荡的10年。虽然近年来西欧有记录的人口流动趋于下降,但没有记录的非法移民却在稳步增加。中东欧地区移民的特点是短期、短距离的跨境流动居多。在北美,入境移民的主要动向是永久定居。在亚太地区,移民的原因被归结为四种:目标国的移民入境政策,外部强权的干预,中东的发展,东亚、东南亚和南亚自身的经济开发。当前,亚洲移民的主要问题是全球化时代的主权受到挑战以及跨国社群的出现,还有非法移民也是亚洲国家政府特别关心的问题。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迁移具有多种形态,最常见的是地区内迁移,这些移民包括工人、非法移民、游牧民、边境工人、难民和高技能专业人员。由于该地区社会、经济和政治局势的变化,人口迁移模式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非正常迁移增加、迁移路线多样化,移民中出现贩卖人口现象。该地区内人才流动越来越多,尤其是流向经济快速增长的核心地区;劳工移民日益为商业移民所取代。拉丁美洲移民愈来愈流向美国,加勒比地区的移民则流向加拿大。据统计,“拉美裔美国人占美国总人口的8%”。1990年以来,“美国的拉美裔人口增长了38%,达3100万,而美国总人口只增长了9%,而且超过1/3的拉美裔人口还是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因此有人预测,“到2005年,拉美裔将第一次超过非拉美裔的黑人而成为美国最大的少数民族”。

[美]彼得·邝著,杨立信、寿进文译:《新唐人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参见解韬:《经济全球化与国际人口迁移》,《广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参见[土]塞利姆·铁木儿著,黄觉译:《国际移民的趋势变化和主要问题:教科文项目概览》,《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01年,第18卷,第3期。

参见[英]约翰·索尔特、詹姆斯·克拉克著,黄仕琦译:《UNECE地区的国际移民:模式、趋势与政策》,《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01年,第18卷,第3期。

参见[英]罗纳德·斯凯尔顿著,祝东力译:《亚太地区跨国移民之动向》,《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01年,第18卷,第3期。

参见[尼日利]阿得兰提·阿得泊鞠著,黄觉译:《撒哈拉以南非洲国际移民问题及最新趋势》,《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01年,第18卷,第3期。

参见[乌拉]阿德拉·佩勒格里诺著,李存山译:《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国际移民动向》,《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01年,第18卷,第3期。

Martin N. Marger, *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 Belmont Californi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1, p. 279.

John Bentham, *How Young Hispanics are Changing America*, Newsweek, July 12, 1999.

三、总结与讨论

通过经济全球化与国际人口迁移的探讨,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看法:

1. 人口大规模国际迁移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国际移民是世界各个地区社会转型和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随着移民的流动数量增长以及新的流动方式出现,其重要性在 21 世纪势必还要继续增加。移民是当地社区和国民经济融入全球关系的结果,同时又是促使移出和输入国家发生进一步的社会转型的原因。但是,许多国家政府对入境移民只有短期措施,且这些措施往往效用有限。因此,有学者呼吁:“国家之间应制定长期合作战略,以使迁移规范化,防止对移民的剥削,并使移民促进可持续发展”。“要制定有效的政策,需要将移民作为长期的,与全球化、现代化密切相关的社会过程来理解。”我们应该响应这些学者的呼吁,积极开展全国、地区以及国际性的合作研究。

2. “现代化包括市场的扩大”,“全球化使市场和平等机会愈多,人们在全球化过程中为寻求更好的机会而流动也就愈多”。因此,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必然引起人口流动加速。中国人口的国际迁移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无论是规模上还是范围上都还会加大,包括“中国人移民非洲的人数也将大大增加”。这就为中国人口提供了一个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一个更大的施展竞争力的舞台。我国不应该只是把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思路引向控制人口数量的单行道上,而应该把潜在的中国人口数量优势发挥出来,参与国际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扩大劳务输出,拓展就业渠道。有学者指出:“在全世界的移民潮中,中国人按其人口比例仍是平均移民水平较低的群体。巴基斯坦自 1971 年以来,劳工输出迅速增加。1981 年劳工输出达到高峰,为 16.84 万人,1986 年跌至 6.75 万人,以后又逐年回升,1990 年和 1991 年输出的劳工分别为 11.55 万人和 13.50 万人。现有大约 350—400 万巴基斯坦劳工在国外工作。”有的国家因增加了劳务输出,降低了失业率。如菲律宾,“1994 年共有 56.5 万工人被招募到其他国家工作。另有 15.4 万人在外轮上当海员。劳务输出对于菲律宾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劳务输出,菲律宾的失业率要增加 40%”。因此,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应该为劳务输出创造有利的条件。

3. 在鼓励留学生学成归来报效祖国的同时,进一步完善“来去自由”的政策。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党的十六大以后,中国必将出现新一轮朝气蓬勃的发展势头,对人才的需求也必将持续增长,这将为留学人员回国工作增加新的吸引力。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留学回国人员的工作与生活条件越来越优越,为他们搭建的舞台越来越宽阔,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大有作为。我们鼓励广大海外留学人员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新的贡献。不过,在为国服务的方式上留学人员也可以留在所在国“为华服务”。所谓为华服务,就是在海外光大中华文化,也包括回馈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华人在国际舞台上应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海外华人可以在国外为中国做一些外资引进的工作,

[澳]斯蒂芬·卡斯尔斯著、黄纪苏译:《亚太地区新移民:促进社会和政治变化的一种力量》,《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9 年第 2 期。

Richard M. ūch, *Nation and Citizenship in the Global Age*, p. 118.

李安山:《非洲华侨华人史》,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13 页。

庄国土:《对近 20 年来华人国际移民活动的几点思考》,《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7 年第 2 期。

Stephen Castles, *Ethnicity and Globalization*,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2000, p. 108.

也可以回国讲学、进行学术交流,还可以回国投资办企业,侨汇同样也可以为中国现代化发挥重要作用。“在国际人才流动中,柔性流动是一大趋势。人才不在于所有,而在于所用。事实上,现在有不少海外留学生选择了适合自己为祖国服务的形式。如在上海,已经明确制定了鼓励留学人员短期回国的‘飞人’计划。2001年有214名海外留学人员柔性流动到上海创办企业231家。近几年,近300名留学人员通过学术考察、合作研究等方式为重庆山城提供服务。”因此,我们应调整心态,在鼓励海外华人回国创业的同时,冷静思考我们应为海外华人做些什么。

4.“合理的人口流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生命所在。”面对经济全球化及发展中国家高科技人才和大量资金外流的局面,我国应当加紧修改现行法律,制订一部适应我国国情的移民法,在宪法上恢复“迁徙自由”的规定,改革执法机构,设置独立的“国际移民事务管理局”,进一步简化出入境手续,加强移民中介机构管理,并依靠法律来规范,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吸引外资和人才,废除计划经济下的落后的户籍制度,以促使人才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双向合理流动,使得资金和人才资源全人类共享。

5.把侨务政策的重心转向新移民,尤其是在海外获得了成功的新移民。“新移民不仅指由中国国内向海外移民,也指20世纪70年代从印度支那向欧美移民的中国血统的难民,他们中有80万人至今留在欧洲,40万人留在美国。”其中不少人的事业发展较快,中国侨务部门对他们的民族意识和亲戚朋友开展工作的决策方针是正确的,这样可以减少他们对中国的成见,缩短其心理距离。新移民是一个不断涌现的群体,富有创业精神,对于其中的成功者,应通过各种方法帮助他们提高知名度;对于非法移民,中国政府当然是不支持,应重点打击其欺诈和暴力行为,仅靠严厉打击还不够,“还要重视对非法移民的治理”,如消除贫穷和腐败问题,实行标本兼治,打击与治理相结合;对于新移民存在的问题,应予以关注和协助,加大其工作力度,“促进新移民与原有华人社会、新移民之间、新移民与家乡的联系”。

(责任编辑 马 骅)

史畅:《“海归族”回归发展趋势》,《国际人才交流》2002年第4期。

鲁西奇:《移民生存与发展》,《读书》1997年第3期。

参见翁里、夏虹:《论美国新移民法的国际影响》,《浙江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杨初晓:《从海外华侨社会的主体变化看中国侨务政策的新动向》,《社会科学》2002年第11期。

林胜:《非法移民: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人口与经济》2002年第6期。

庄国土:《对近20年来华人国际移民活动的几点思考》,《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7年第2期。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Li Qirong (21)

Abstract :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terms of its historical origins, government policy concerned, new characteristics and types as well as its influence. Besides, the author also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China 's migration policy in the situation of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 economic globalization ;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 migrants.

A Study of the System of Educational Policies for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Wang Jian (33)

Abstract : The system of China 's educational policies for ethnic minorities means the basic extension and structure of the educational policies for ethnic minorities. It includes six policies respectively for educational quality, educational management, educational courses, educational funds,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se policies, interacting with other government policies toward ethnic minorities in terms of ethnic culture, religion and language, form the system of educational policies for ethnic minorities with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educational practice has proved that the policy system is scientific, correct and effective. From the view of theoretical origins, it has value orientation both in the aspects of state nationality and state education.

Key words : education for ethnic minorities ; policies for ethnic minorities ; policy system concerning education for ethnic minorities.

Bride Price in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Bride Price among the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Qu Ming 'an (42)

Abstract : With the cross-cultural comparative method, this paper studies the bride price among the ethnic groups in China, includ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ypes of bride price and the consumption structure, as well as the items, social functions and rules of the bride price. The study of the bride price with the cross-cultural comparative method, the author thinks, has academic significance to understand both the special needs of different individuals and groups in the process of marriage conclusion and the socio-cultural norms of various ethnic groups in terms of marriage and family.

Key words :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 marriage ; bride price.

The Dispute Management in Traditional Hakka Villages : A Fieldwork in the Villages of Northern Wuping County, Western Fujian Liu Dake (54)